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81年1月

19

星期一

第8054期

法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将于下月访华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题：中国：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即将访问

可靠人士一月十五日获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下月将对北京进行访问。

然而，这一访问的准确日期还不知道。观察家们指出，密特朗（他是他的党参加法国不久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的访问是北京实行的向西欧左派运动开放政策的整个步骤的一部分。

去年六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曾指出，密特朗如果愿意来中国，他会受到欢迎。

外电评述《人民日报》一月十七日社论

【美联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菲尔·布朗）中国的主要报纸今天在大加要求加强纪律，以解决经济和政治难题的同时，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

《人民日报》没有对这些企图作详细说明。但是，这家报纸说，中国愈是对外开放，就愈是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以便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

中国曾经警告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在台湾的反共的国民党中国。然而，今天的社论谈的是在中国的“颓废”影响的危险。

北京各家大报均在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这篇社论还敦促要采用“四人帮”那一套“打、砸、抢”手法的残余的“造反”分子和新生的“坏”分子保持警惕。社论说，不能允许这极少数人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这篇社论是继中国最高领导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上个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要求加强纪律的重要讲话之后发表的一系列社论中的最新一篇。

在经济方面，中国正在为解决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失业问题而斗争。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被归咎于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此外还归咎于一些中国出不起钱的好高骛远的基本建设项目。

在政治上，共产党承认，文化大革命之后，它的威信下降了。《人民日报》再次对一些抵制党的现行政策的党员发出了警告。《人民日报》说，民主还需要发展，但也必须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刑

事犯罪分子。以保证调整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安定团结。

【合众国际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雷蒙德·威尔金森）中国今天说，这个国家会遇到经济和社会混乱，除非共产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并无情镇压企图推翻已确立的秩序的持不同政见者。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上的这一警告是迄今官方发出的最明白的信号，表明领导人决心进行镇压以设法重新确立控制。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七日电】（记者：德隆）中国领导正在为了中国的“政治安定和经济调整”而加紧思想控制。

官方的《人民日报》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分子和要求同外国扩大接触的持不同政见分子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该报强调说，“政治上的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

共产党关报在一篇社论中重申，中国共产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应当放在首位。

这家报纸还谴责了那种认为这些原则妨碍“解放思想”的混乱思想。

这家报纸实际上是威胁要对存在这种“混乱思想”的分子加强思想控制。这家共产党机关报在警告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干涉它的内政——据观察家们说，这一警告是针对国内的一时加上了一个限定，即重申中国要继续学习“一切外国对我们有益的事物”。

共产党机关报敦促全党全国“坚决打击……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活动”。

在这些人中，这家报纸特别谴责了文化大革命激进领导人的“死不悔改的残余势力”和“继承他们那一套的新生的坏分子”。

这家报纸特别谴责那些要求恢复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四大自由——其中包括贴大字报的自由——的人。这些权利已于去年九月正式取消。

今天的社论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多于最近中国报纸言论中的批评。

乔森潘向记者介绍参加抗越的诺林达拉邦

诺林达拉邦说他愿为柬埔寨的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法新社曼谷一月十七日电】泰国《民族评论报》今天说，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向记者介绍了一个他说是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儿子的人，说他最近参加了反对越南占领柬埔寨的游击斗争。

据说这个人是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在《民族评论报》记者昨天到乔森潘的丛林根据地采访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时，诺林达拉邦被介绍给了记者。

据说，这个人说他是

西哈努克亲王的二儿子。

亲王的这位二十六岁的“儿子”说，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南人率领的部队接管金边时，他正在莫斯科。他说，在这次出兵推翻了他四年之久的红色高棉统治之后，他在北京会见了他的父亲，后来到了巴黎参加了流亡的柬埔寨人组成的一个反越运动。他说，他在去年十二月参加了红色高棉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他讲话时由被赶下台的政权的社会福利部长英蒂丽为他翻译。

他还说，他不想在这个阵线中取得什么“职位”，只是“为柬埔寨解放战争作出贡献”。

他说，他最近曾写信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现在在北朝鲜首都平壤，但是迄今未收到回信。他说，“除了同民主柬埔寨协力争取国家的团结外，我预计他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现在正艰苦地发动一场深入宣传运动的红色高棉，一直努力让西哈努克来领导其打破河内对柬埔寨的控制的努力。

香港文萃

《亲王式政治手法又来了》

说西哈努克把他讲话的录音带送到泰柬边境以向国内传播

到泰柬边境以向国内传播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月二日一期刊登的原文摘要】西哈努克亲王式的政治手法又来了。尽管柬埔寨前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久前宣布了他要退出政治斗争的不可逆转的决定，但是他在正在渐渐地返回政治舞台。这位亲王第一次以录音带的方式把他的信息传到了泰柬边境，以便秘密地传进他的国内散播。这一行动对柬埔寨政局的影响可能比他以前的任何行动都更为重要。

本编辑部获得了一位西哈努克讲话的盒式录音带。他通过巴黎的一位中间人把这信息送到泰柬边境地区。他的讲话驳斥了越南和韩桑林政府关于西哈努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红色高棉和中国人同谋的说法，并扼要地谈到了他为重建一个既不是北京的卫星国也不是河内的卫星国的中立的柬埔寨而作的努力。西哈努克告诉本记者说，他是应柬埔寨边境地区的同胞们的请求，传送这个信息的。

西哈努克亲王把他讲话的盒式录音带送到泰柬边境上亲他的集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收到最大限度的影响，而又不致于被人认为是他同正在柬埔寨抗越的红色高棉或是自由高棉集团是一伙的。

色高棉或是自由高棉集团是一伙的。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说明了为什么说他同红色高棉勾结的越南和韩桑林统治集团本身是波尔布特在一九七七年当波尔布特想把柬埔寨变成中国的卫星国时，韩桑林集团才脱离波尔布特，与此同

时，韩桑林决定请求越南和苏联打进柬埔寨。他说，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红色高棉当政时怎样进行大屠杀，但是他看到强加给人民的苦难。一九七六年三月，他拒绝了红色高棉提出的要他继续担任挂名的国家元首的建议，结果他被软禁，和自己的孩子们分开了。据说，其中有一个现在在金边。亲王告诉他的同胞们说，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以来，越南人侵犯以后，红色高棉释放他时，他曾不断地谴责罪大恶极的法国和反人民的民主柬埔寨。同时，他出于对同胞的关心，曾告诉过全世界人民，宁可要越南人的保护，以防止红色高棉卷土重来。因此，他现在说，越南人说他是红色高棉的同谋，是无耻的欺骗。

西哈努克还驳斥了说他同中国勾结的指责。他指出，他批评中国支持红色高棉，是由于同北京之间有着非常严重的和长期的分歧。我躲到了同一平壤。西哈努克在他讲话的最后部分指责、责骂、责骂林和（副主席）宾索万一把威岛和暹罗湾的其他岛屿以及一些边境村庄出卖给了越南人。这位亲王说，柬埔寨即将举行的选举，如果没有各政党的参加和国际上的监督，将是无效的和非合法的。但是，他抵制这次选举就结束了他自己的讲话。

这里的一位政治观察家说，荷兰坚持这笔买卖、毫不退让的立场应当是对即将上任的里根政府的一次教育，使它懂得，不能让北京左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法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今天据从上海到这里的旅客说，张贴在上海市委大楼外的一张市委布告中规定，同禁止“侮辱干部”一样，禁止“参加集会和发表公开演讲”。

【时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解放日报》呼吁同破坏势力作斗争。《解放日报》十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呼吁同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作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说，“现在依然存在

荷外交大臣告中国驻荷代办说 荷将不取消向台湾出售潜艇的决定

【路透社海牙一月十七日电】荷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尽管中国对荷兰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让荷兰向这个岛国出口两艘潜艇，但荷兰政府还是决定要出口，台湾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

外交部发言人刘达人说，“我们对荷兰政府表示钦佩，对它坚持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原有决定表示高兴。”

台湾当局表示高兴

【合众国际社台北一

【路透社海牙一月十七日电】一位政府发言人今天说，尽管中国对荷兰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不让荷兰向这个岛国出口两艘潜艇，但荷兰政府还是决定要出口，台湾对这一决定感到“高兴”。

【美联社台北一月十七日电】一位台湾的高级经济官员今天敦促荷兰政府，在拟议中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的问题上，决不要屈服于北京的压力。

经济部长张光世在接见记者时说：“荷兰没有理解大陆中国的威胁，这是好事情。”

台报说林洋港不参加里根就职典礼 但蒋彦士、阎振兴将参加

【台湾《中国时报》一月十七日刊登该报驻美特派员的一则消息】由参议员哈特菲尔德担任主席的国会就职委员会已明白表示：中华民国受邀者，是以个人以及著名美国人士贵宾的身分，应邀参加这项就职典礼，而不是以

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前来参加。

就职委员会人士说：中华民国受邀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士，将坐在保留给贵宾的好位置，距离华府外交使节团的坐席不远。本报获悉，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将不参加里根的

就职典礼。林洋港是中华民国最先受到邀请的五位特别来宾之一。其余四人当中，蒋彦士和阎振兴已经在美，将会参加。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和辜振甫，如无最后改变，也将参加。

此外，中华民国还有其他的个人和团体，应邀参加里根的就职典礼。其中著名的有蒋一成。

【西德《明镜》周刊十二月一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副题：本刊编辑雷娜特·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

西德《明镜》周刊

《默克莱因谈北京经济的新秩序》

中国正在进行新的经济改革的实验。如这种改革成功，那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中国领导的信条听起来对人民是友好的而且是现实的

北京领导人为了进行改革，正在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意见。这种改革假如获得成功，就有可能赐与中国人一种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优越得多的经济制度。因为毛的接班人试图在其国内慢慢地解决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制度都感到烦恼、并使公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那些内部矛盾：通过增加市场经济，减少计划经济；加强企业的自我负责制；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逐渐重新“恰当地”确定价格。

而且，根据改革者的计划，社会主义在新中国仍然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原则上不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而是属于人民或合作社。

最初描述怎样才能经济上正确地（也就是说在不持续地浪费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大利人恩里科·巴罗内，写于一九〇八年。

巴罗内当时就得出类似于现在中国改革者所得出的结论。巴罗内说，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现有的手段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它就必须承认包括在每一种合理的经济学中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所有那些因素。

例如：当一种商品比其他的商品相对来说短缺或充裕的时候，就必须变动价格；消费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不同质量劳动的不同报酬；关闭不赚钱的企业，也就是解雇劳动力；资本要有利息，因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也不能无偿地分配给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为否则会造成巨大浪费，并从而产生破坏繁荣的结果”（巴罗内语）。

因此，一个设计合理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必须象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挥作用，因为逻辑和合理性（它是任何高效率经济的前提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和无情的。

西方市场经济学家的论点同中国人的经验是完全

相符的。例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顾明对一位西方客人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所有直接由国家控制的企业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您的国家都如此。”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无疑，转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成根据供与求的相互作用恰当地确定价格，转变成由利息操纵生产资料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么多年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

因此，新的中国领导人只是想非常谨慎地和小步子地使经济体制变得灵活一些和提高效率。

领导着强有力的计划委员会的副总理姚依林对来自西方的一位客人说，“中国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中国的计划者在限定的局部地区内，在几千家企业中对各种不同的自由化设想进行试验，以便通过小规模，因此也不会冒太大风险的试验寻找一条尽可能短的道路，以摆脱社会主义正统做法和求得进步。

在试验的范围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多得到一些自主权的六千六百家企业（总共有四十万家企业）已有一点繁荣的景象。在最近十二个月中出现的一些小型自由市场，显著改善了对居民在新鲜肉类、新鲜蔬菜和新鲜水果方面的供应。

已经有数十万家小型私人企业，大多数是服务行业，它们不需要配备大型生产资料；它们能够方便、灵活和迅速地供应居民希望得到而松垮的国营企业又不能提供的那些东西。

在所谓经济特区——在东南和南部有限的地区，例如在香港以北的深圳——笼罩着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中国人不久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在那里推行了“一项非常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主管投资的副总理谷牧语）。那里在建设，在经营；那里的建设气氛和希望差不多象是在当时五十年代的西德。

然而，为什么北京操纵经济的人仍然执行谨慎的，首先只是有限地进行改革的政策呢？毛遗留下来的这个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饥饿一直还是一种危险。因此，在这个国家中每一项较重大的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甚至某些正确的、但操之过急的改革至少都有可能使某些集团的生存受到威胁。

中国是一个本不该这么穷的国家，但由于它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一样，接受了苏联的一种管理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完全没有可能最佳地利用经济资源。

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未达到本来有可能达到的程度，也是因为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通过在社会政策上进行荒唐的试验，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民族心绪不安并且陷入混乱状态。

迄今为止，中国在承受着所谓“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及其后患带来的后果。毛及其追随者想通过这两场大规模试验造就共产主义的新人。在这两场试验中仅仅第一次试验就使中国倒退了许多年。

这种代价不能仅仅用所耽误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来衡量。文化革命即中国说的“那十年”，花的代价更大。因为在这段期间有些学校，尤其是许多大学都关闭了，所以整整一代人，即现在将近三十岁至将近四十岁的人当中有许多没有受过或者只是受过不完全的培训。此外，这次试验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百分之十左右的文盲——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前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说明，在这两次试验之后对中国整个经济造成的结果用货币来衡量是怎样的。现在的改革者是从这样的结果起步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增长速度以及今天的实际状况，要比一些邻国或也是由中国人经营和工作的那个独立的省份慢得多而且也低得多。虽然饥荒不再存在，人的寿命相当高，为七十岁。但是，消费的状况在大多情况下显然是很低的——低到以致最重要的基本食品，还有布匹不得定量供应。（上）

英文报章

《俄国的卢布太多，而东西太少》

这就是说，这些钱是

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品名	芝加哥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元/蒲式耳)
小麦	5.02
玉米	3.78
燕麦	2.26
大豆	7.87
豆油	24.63

品名	纽约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格) (美分/磅)
食糖	26.65
棉花	92.77

“优厚的”奖金或猛增的工资的变种，就是专家们所说的许多工人干的活，实际上不配拿那么多的奖金或工资。

这也就是说，私下收入来自“干私活”，从事个体农业，进行投机活动和非法买卖。

由于这些“外快”卢布，苏联一些人发财了，而且国家的一些商品也因此而更加长期短缺。可获得的现金远远超过商店出售的商品量。

某些经济学家和共产党官员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国家不给有“外快收入”的人免费医疗，而且规定他们必须支付房屋保险费。

收入来回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弗里尔·波波夫博士说，“有

人认为，我们应当比现在

更确切地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数额和来源”。

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读者写信给该报，要求制订一项对个人收入来源进行监督的法律，以监督“有欺诈行为”的人。

“干私活”有利可图。《真理报》最近报道说，有这样一些事例：“工程师干工人的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隐瞒实情，因为他们认为提高他们的资历并没有多拿报酬，这样的事例并非少见”。

这家报纸直截了当地谈到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接受技术教育越来越不感兴趣。

官方统计材料说，苏联平均月工资为二百卢布（一百二十五英镑），但是，私下收入，往往使实际收入大大增加。

个人储蓄迅速增加，部分是因为人们买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消费品 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说，解决收入过多问题的第一步必须是增加高质量消费品的供应。波波夫提出了回收货币的另外一些主张。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利用想买汽车的人的钱再建一座汽车厂，然后再用汽车来偿还股东的股本呢？”

他还提出了合作建房的方案，并且在一级和二级旅行及旅馆价格之间划一条比较明确的界线。

在新加坡的公共汽车上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我最近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

听说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秩序好，服务态度好，我尚无亲身经历。最近，我到新加坡采访时试坐了一次，果然有很多先进之处。我挑了市内公共汽车车次较少、乘客较拥挤的一二一路车。夕阳的余辉照在马路旁的车站顶棚上，等车的大约有二十人。秩序很好，人们自觉排队上车。车上有十多个空位，先上先坐，没有抢位现象。我最后一个上车，车厢内迎面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英、中文写着：“上车后往前站”。

我的眼睛往两边一扫，果然没有人堵在车门口上，倒是我还呆呆地站在离中间车门约一公尺处，犯规了。于是，我迅速地往前走。

新加坡的公共汽车的设计多样化。一般是前后各一个车门。但我乘的这辆却只有开在中间的一个门，车门正对面的乘客座位旁有一个门框着，上面写着“安全门”的红字，大概是有紧急事件才打开吧。

车上另一块较大的布告牌扑入我的眼帘：“本车只准坐四十一人，站十三人，三个小孩算两人”。这引起我的好奇，用心一数：此时车上站着的乘客，连我共九人。我指着这块牌子问正在车上忙着的华族女售票员：“这条规定能做到吗？上下班时，人多了怎么办？”她笑着说：“一定要做到”。市内汽车多，站着的乘客一般不会超过十三人。这个数字是调样后确定的。”我接着问：“如果超过怎么办？”她答：“警察发现了要警告司机和我。再犯规时，要对我们两人罚款！”“啊，是这样！”我领悟地说。我搜索车上有没有别的布告，发现还有两块。一块写着“严防扒手”四个大字，另一块是：“禁止在车上

吸烟，违者罚款五百元”（本刊注：一新加坡元相当于人民币七角）。我来新加坡以来看到吸烟者甚少，办公室及公共场合又禁止吸烟。我想，“烟民”们大概只有在家里才能自由地吞云吐雾了！每个站都有人上下车。空出来的位子往往两三分钟内没人坐。青年人坐，中年妇女走去生的多。据说，如果有老人、孕妇或抱小孩子的上车，大家是争相让座的。新加坡每年举行一次“尊贤敬老周”，看来有成效。

车门口处挂着一个废票箱，我看见下车者都把废票往里扔。有一个旅客忘记扔进去，我跟着他下车要看个究竟。只见他下车后不是把票撕碎扔在地上，而是走了一段路，投入路边的废品箱里。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能够这样遵守纪律呢？”他说：“我曾因不遵守卫生规则而被罚款，因此牢牢记住了。其实，从学校时代开始，我们就都养成爱卫生、守纪律的习惯了。”

夜色朦胧，我跑了一天也累了。往那里去好呢？忽然，我看见路边车站有一排坐凳，离它不远，在人行道的树下砌有三排水泥椅子。在水泥椅坐下去后，默默感谢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设计：他们为乘客和行人想得多么周到啊！

据悉，新加坡市现在共拥有二千七百七十八辆公共汽车，行驶在二百零八条路线上。它们有单层和双层车，按照市区、郊区、区间和长途等不同，而在车上涂着不同的颜色，以便乘客识别。辛勤的司机和检票员除了执行行车任务外，还是检样和维护乘客规章和社会秩序的积极分子哩！（杨木寄自新加坡）

国外
· 见 闻

加拿大驻伦敦高级专署表明，一九七八年四千一百人，一九八接受八千七百人。提请的总人数两年中从人增加到四万一千但到中东和美国的人得多。去年移居外国人的总数比一九七增加了二万一千四百达到了近二十万九千而外国来的移民增加千九百人，达到约二万三千人。

经过分析斯大林的作法，我们大家似乎都认为，斯大林这样做，也只是耍手腕，特别是就此同他争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最好保持沉默。我们相信，斯大林运用同西方大国斗争的种种手腕，还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当然，我们的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同斯大林的这次会谈得出的，而且也是以铁托以前同他的会谈为依据的。本来，我们的关系，也包括经济关系，发展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给这一进程制造任何麻烦。（五）